

香港 · 文化 · 研究

吳俊雄

馬傑偉

呂大樂

編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2006年初版

2007年第二次印刷

ISBN 978-962-209-786-5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本社提供網上安全訂購保障

<http://www.hkupress.org>

青塔印務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作者自述	vii
1. 港式文化研究 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	1
2. 無關痛癢的1974 呂大樂	21
3. 茶餐廳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梁世榮	45
4. 創造不一樣的公共空間： 香港婦女運動發展的空間政治 谷淑美	87
5. 當麥嘜遇上文化研究 吳俊雄	115
6. “唔怕生壞命，最怕改錯名”： 香港年輕人的英文名字 陳效能	155

-
7. 偶像與香港文化英雄：
解構陳慧琳的歌迷文化
馮應謙 175
 8. 港式“人民力量”：
七一的動員形態與民意政治的重構
陳韜文 197
 9. 跨境空間：
在中國大陸工作的香港人的階級政治和身份認同
潘毅、黃洪 233
 10. 市井國族主義：
重劃大陸與香港的文化版圖
馬傑偉 257

1

港式文化研究

吳俊雄 馬傑偉 呂大樂

香港的普及文化成為一個認真的研討課題，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在本地刊物《文化新潮》、《號外城市雜誌》、《電影雙週刊》、《大特寫》及一些文化團體主催下，來自不同背景的文化人在1979年2月18日於香港藝術中心舉辦了一次一整天的“第一屆香港普及文化研討會”，是為香港普及文化研究的開始。¹ 而普及文化評論也於八十年代開始在本地報刊蓬勃發展起來。² 以一種介入社會，跟群眾對話的研究和寫作態度來分析普及文化，是香港普及文化研究一直以來的特色。

1991年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辦了第一屆《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與會者背景不同 (冼玉儀與黃霑同枱議論)、學術源流相異 (由文本分析講到工業前景)，但都着意運用當時較系統和新穎的理念，去分析香港文化與社會的狀況。研討會和其後結集的專書，在學術界引起迴響。不少人認為，它們宣佈了本土文化研究在學術研究機構正式起步 (Sinn, 1995)。

1991年至今，香港文化研究和社會環境經歷百變，學界相關的研究，亦有令人側目的發展。³ 香港文化研究不但成為了大專院校課程的一部份，相關的研討活動更在不同院校活潑起來。

2002年初，十位本地學者聚首，一致認為有必要替這個發展作出盤點，並自覺需要介入新的社會、文化形勢，針對新的課題提出分析。2003年11月，新一次《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正式舉行。它跟1991年的研討會沒有任何組織上的連繫，但在精神上卻有明顯的血緣。如果1991年是本土文化研究的播種期，在2003年我們見到其中的一些成果。這次研討會和這一本專書，有兩個特點：

一、它在學術上有一個較成型的面貌。參與者對於在本地搞文化研究的中心話題、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以至寫作策略，皆有一個相對堅實和共同的認識。這種共同認識，算不上一個理論典範，但它足夠讓取向不同的研究者，有一個一起辯論和協作的平台，令議論和研究的成果可以有所累積。

二、它突出了本土文化和社會的特殊性。文化研究由歐美學界發起，當中不少概念和範例，屬英語世界的舶來品。過去幾十年香港文化和歷史詭異的發展，逼使本地文化研究者不得不慎防事事以“西方”為先，嚴選中心概念、注意地道民情。它要求大家去問：怎麼樣的概念和分析，才可照顧不同社會文化的共性和差異？怎麼樣的文化研究，才可適切香港本土歷史、體察民間習俗、透視個人和集體的地道心情？

以下我們將就這兩個特點詳加引述。

本土文化研究的基本形態

這本文集的文章，有幾個共同的基調。這幾個基調，在1991年的研討會首先提出，在2003年的研討會茁壯成長。

A、平民生活是焦點

文集的作者不論是作歷史探索還是現狀深描，一律自覺地以平民生活為焦點。在這一點上，他們明顯地採納了Raymond Williams對“文化”那個接近人類學式的定義——文化不單是放入博物館的殿堂正典或存檔成案的“高等文化”，它更加是日常的“生活方式”(Williams, 1980: Chapter 1)。他們認為有血肉的文化研究一定要強調“平民”、“普及”、“意外”、“變化”，繼而從意外多變的平民生活洞悉社會權力和身份的變遷。因此文集的文章堅持由微觀出發，研究焦點集中日常生活各個範疇，包括追尋茶餐廳、分析英文名字、閱讀漫畫、貼近歌迷、翻弄市井精神，視察街頭抗爭、尋找女性足印，甚至連回望歷史，都強調在主流史學尺度中屬於“無關痛癢”的生活點滴。不少論者誤以為文化研究就是流行文化研究，而流行也者，就是歌、影、視以及潮流、商品、消費，並以此批評文化研究是趕新潮、嘩眾取寵……但我們所重視的，不是浮面的時尚，而是貼近平民百姓的生活與感情結構。我們關心普及文化，不是偷取明星光環，而是在於分析庶民習性。我們關心的議題，不單是舞台上的星光，也包括被流行市場所忽視的弱勢聲音。

B、跨學科

文化研究關注普及文化，因此民間的方言、飲食習慣、消費方式和大眾媒介的運作，都可以是研究的對象。既然素材如此廣泛，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很容易在當中找到自己的專門興趣，和引入自家的指導性概念和研究方法。與此同時，文化生活由微觀到宏觀的延續，以及個人身分和社會權力的交疊，亦使研究人要跳出自己學科的疆界，跟學術上的陌生人採長補短，甚至在同一個研究當中自覺地運用不同學科的工具。歐美學界過去二十年的經驗告訴大家，文化研究天生是要跨學科的。

1991年的研討會已經以跨學科為其中一個特色，2003年的研討會在此更跨前一步。它因為有歷史，文學、社會學、傳播研究、人類學和政治學的交流碰撞，而更能觸發新的觀點。本文集繼承了這個特點。例如陳效能的《唔怕生壞命》運用了系統的問卷調查方法，探討了不同類型的英文名字在不同群體的分佈，以及各種名字牽引出來的想像與投射，是典型嚴謹的社會學量化分析。陳韜文的《港式“人民力量”》以系統的民調資料做基礎，總結了政權管治與民眾反動的微妙關係，是政治傳播學的有力示範。書中不少文章，本身已是一個集合各方理念與方法的產物，例如《無關痛癢的1974》(呂大樂)、《茶餐廳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梁世榮)，與及《創造不一樣的公共空間》(谷淑美)不約而同地結合了歷史研究和論述分析，令我們對有關的歷史發展，有更迂迴和多層次的洞悉。其餘章節的文章亦不同程度地打破方法學的教條，質性傾談與量化

數據共用，民俗誌與組織分析並行⁴，實現跨學科的吸引力。事實上，跨科整合，到了某個地步，已模糊化了“文化研究”與其他社會人文學科的邊界。

C、強調人文的科學

2003年的研討會，沒有專文討論文化研究的哲學基礎，特別是有關實證主義、詮釋學和後現代理論的辯爭。無可否認，這亦是本土文化研究尚待收成的一部份。在此，與會者提出了一些“底線式”的觀察：“文化”必然牽引一個社群內個人和集體對某些事物的“詮釋”，文化研究最關心的是人的“理解”、“關係”以及這些因素跟特定社會條件的互動。因此與會者傾向對“科學研究”採取類近人文學科的看法，強調迂迴深切的詮釋，不拘泥於斷定數據比例，或找出因果式的鑑證。

與此同時，他們相信研究文化一定要走入民間，剖析在地的理念和實踐，因此亦強調具體研究（相對於理論或大理論meta-theory的爭辯）的重要性。文化研究的對象可以是生活習慣、社會觀念，或包含象徵意義的文本；它的研究方法可以是訪談、參與性觀察、民俗誌、問卷調查，或文本分析，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個對文化現象嚴謹、有佐證、引人入信的演繹（informed interpretation）。靈活的概念，豐富的研究資料以及開明的辯論，是推動文化研究的根本保證。

香港文化的特殊性

本文集的作者在以上提出的三個共同基調上，開展了各種細緻的研究，由歷史到現狀，既貼身也宏觀，講社會條件，也談庶民心事。文章反映了香港文化與社會多方面有趣又複雜的發展。它們指出香港在許多方面經歷了一個急劇現代化社會普遍面對的壓力和機會。它們同時肯定香港社會發展的軌跡，對本土文化有一種很特殊的、整體的規範。它令香港存在着種種可能在亞洲地區以至全球各地皆屬獨一無二的文化境況。要確切分析香港文化，就不能不了解這個軌跡、這些規範和特殊的境況。在此，我們不能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的工具，認識香港本土狀況，甚至可以幫我們擴充整個文化研究的工具庫。

香港文化和社會的特殊性見諸以下七點：

A、吊詭的殖民經驗

香港自1841年起，受英國殖民。它的歷史有眾多殖民管治一貫的痕跡：英文是官方語言、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立法議會長期封閉、西方財團利益受保護、基層政治組織受壓制。但跟其他殖民地不一樣，香港很早就被英國人栽培成一個南中國的“經濟窗口”，它的營商環境、通訊航運設施、法律制度，甚至教育配套，在這百多年逐步確立，在二次大戰後更有驚人的發展 (Siu, 2003: 113-4)。這段殖民地經驗令到香港社會有一個很奇怪的格局：政治冰封，但經濟發熱，文化上一方面迂腐保守，另一方面又奔向全球，跟西洋現代性接軌。

這個吊詭的殖民格局，造成了九七前香港文化那種特

殊的“性格”：少說政治、務實進取、績效先行，強調程序理性，同時又局部吸收西方現代文明道德（例如公平和公義）（呂大樂，1997：40-6；Ng and Wong, 1999：233-53）。文集的文章對這一個矛盾的文化大染缸，直寫側描，突出了這段特殊的殖民歷史，對瞭解今天香港社會與文化至為重要。

B、吊詭的國族認同

香港的殖民身世，令“香港”跟“中國大陸”有十分微妙的關係。殖民政府一直着意經營一個有利自己穩定統治的環境，在政治上它依賴行政吸納本地華人精英，在文化上它靠淡化民眾對國族的知識和認同。殖民政府這種兩手策略，在1949年共產黨執政之後更加牢固。這造成了香港戰後文化版圖上馬傑偉所謂的“去中國化”（*de-sinicization*）現象（Ma, 2000a: 173-9）。羅湖邊境的出入政策逐步收緊，教科書和傳播媒介對中國歷史和政治避而不談。結果在戰後一代香港人心中，中國等同陌生、神秘，甚至恐怖。“香港”跟“大陸”的分離，是近二十年香港本土意識興起的一條伏線。

有趣的是“去中國化”是一個“未完成”的工程。香港民眾對“政治中國”抗拒，但對“文化中國”卻有細水長流的認同。這個認同，即使在共產政權陰影最強的階段，亦從未間斷。這可見諸各種由大陸南來的方言俚語、藥療食譜、民間節令、神話傳說的延續和擴充。此外，不少南來文化人（特別以小說和電影）直接將“中國人在香港”的貼身經歷，化成文字和影像，開拓了有關“尋根”

和“散葉”的討論(余少華, 2001: 1-15; Mathews, 2003: 51-72)。因此, 從很早開始住在香港的人對於“中國大陸”有一種欲拒還迎, 既疏遠又行近的吊詭感覺。九七前後, 香港經歷“再中國化”, 當中挑起的文化和政治拉鋸, 是這個吊詭的新篇章。

C、超速的城市經濟發展

1949年之後, 香港人口急劇膨脹, 醫療、房屋和教育設施嚴重不足, 經濟前景絕不明朗。今天, 以任何標準衡量, 香港是一個超級發達的經濟城市。這個戰後五十年高度壓縮的發展經驗, 給香港生活帶來至少三個特殊的面貌。

首先, 香港戰後一代高速地由貧變富, 經歷了集體的向上移動, 令他們對企業精神和科層績效文化無比信任(呂大樂、王志鏘, 2003: 第3章)。第二, 高度和急速的人口匯集和城市化, 令香港民眾有一種比其它國際大城市居民更密集、聚焦和更相互牽連的狀況。今天香港民眾追求資訊和挑動集體情緒的強度, 正反映了這個壓縮的城市佈局和發展經驗(Baker, 2003)。

第三, 急劇發展的一個結果, 是戰後一代普遍樂觀、自豪。因為殖民地的處境, 這種心情不能演變成對國族的自豪, 或對政治前景的樂觀。香港民眾將自己發展的成績投放在媒介演藝事業和消費活動身上(Leung, 1999; 111-34)。

D、以媒介和消費為身份軸心

一直以來西方文化研究者都着力探討媒介和消費活動如何反映社會的主流意識和民眾複雜的心態。他們稱媒介和消費是現代資本主義兩個最重要的製造“象徵意義”的場所。這個關注，在香港有獨特的意義。七十年代末，不少學者以受阿當諾影響的“大眾文化”理論去批評那時候的媒介和消費現象(姚堯，2002)。今天看來，這個觀點其實未能有效面對這些複雜現象和它們在香港文化脈絡的特殊性。

香港戰後高速的經濟發展，造就了媒介和消費活動的膨脹。這帶來了歌、影、視界各種文化工業大量興起。在九十年代初，它們的產品數量驚人，收入年年上升。在大陸和台灣仍堅持保留各種文化禁區的期間，港產媒介製品更廣泛滲透全球華人社區，變成香港最重要的文化品牌。此外，不斷上升的個人財富和需求，將物質消費推向感性消費，結果整個城市型態是百貨公司夾雜蚊型商場，大眾消費也逐漸被分眾消費取代。不同階層、年齡和性別的消費者各自群居外探，抓着自己喜愛的消費物品，也找到自己的心情和身份(章嘉雯，1990: 18-31；馬家輝，2002: 56-68; Lui, 2001: 23-45; Ma, 2001a: 117-39; Chan, 2000: 98-134)。

不少人指出，在香港這種“演藝事業變成文化品牌”和“消費活動帶動群體身份”的現象，比世上大部份地方都要突出，個中的原因其實不難瞭解：香港壓縮的殖民城市經驗，令民眾心情無處安放，因此對媒介和消費活動——統稱普及文化——有異常的寄託。於是媒介的燦爛星

光，帶給個人歡樂，時尚和品味的展示，反映了消費族群以至整個階級的愛惡。令人最驚奇的，是普及文化竟然進一步建構了香港人的集體身份。

E、媒介建構身份

六十年代是香港歷史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香港的人口流動不定，社會經濟發展相對緩慢，民間整體來說還屬維生的狀態。六十年代開始，土生土長一輩在數量和取向上都變成主流，他們有着類同的成長經歷，也慢慢對眼前的事物表露出共同的感覺和評價。六十年代以後，住在香港的人，開始在醞釀一種集體認同，建立身份。

香港民眾大部份跟中國大陸在人脈和感情上千絲萬縷，但戰後吊詭的國族認同經驗令港人的集體身份不容易找到歸屬。慢慢，地道的成長經歷、本土的憂患情懷，變成了這一代人的集體想像，當中普及媒介起了決定性的聚焦作用。

不少本地學者對媒介建構港人身份的過程，有清晰的描述。他們指出媒介在此過程的角色有三點：一、它將一輩人的不同經歷“再呈現”(re-present)，令眾人有一種知道對方跟自己共存(co-present)的感覺。二、它從本質上可能頗紛亂的現實當中，突顯了(articulate)一個簡化了的、易入口的“香港成功故事”(個人奮鬥加機緣際遇等如香港奇跡)。三、它突出一種自保(又同時帶點自大)的意識，強調“我們”對抗“他們”的境況，將“香港”的美好跟“其他人”(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敗壞對立，繼而鞏固“自己人”的集體身份(馬傑偉，2002: 138-42及681-94；吳俊雄，2002: 86-95)。

這個說法有粗疏的地方。它忽略了即使在七、八十年代，也有其它機構和人物起着類同和相反的作用。隨着回歸，普及媒介在香港社會、政治和文化身份版圖上的地位，亦有微妙的變化。

F、再國族化

九七前後，香港在多方面都出了一個“再國族化”(re-sinicization) 趨勢 (Ma, 2000b; 梁麗娟, 2002)。但香港吊詭的發展軌跡，令到“再國族化”不可能一帆風順。在經濟上，香港從新跟中國大陸接軌，甚至融入它的體制(例如 CEPA) 的趨勢已成事實。從這角度看，“經濟中國”早已在港生根，但“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卻出現了迂迴的命運。近兩年有關基本法二十三條和政制改革的爭拗，顯示了不少香港民眾在政治上力求保持以至擴充香港習慣的法律和議事制度，在兩年的七一遊行當中，更把政治的爭議，上升為文化價值的對立和爭持。“怎樣愛國”、“應否愛港”、“如何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等爭議，代表了“本土意識”跟“再國族化”最新的拉鋸 (陳韜文, 2004)。

G、“超強網絡社會”的出現

在這個拉鋸的過程中，我們見到香港政治和普及文化的一個新動向。2003年的七一遊行，怨氣大、聲音響，但嚴格來說並無嚴密的組織，和自上而上、一呼百應的綱領。相反，不少分析都強調那些相對自發的民間網絡在遊行前後所起的作用。它們指出香港特區政治因循封閉，但

民眾其實飽受西式自由教育、資訊流通、性情外向，他們要求更多“發聲”、“自主”的機會。這個“制度”與“人心”的落差，反映在九七前後一個所謂“公眾輿論群”的出現。這個“社群”有兩個主角：一是反應敏捷、聲色俱厲的大眾傳媒，二是渴求資訊，自建網絡的民間社會。這個“公眾輿論群”透過電台節目、報刊新聞、專欄社論以及新興的互聯網，維繫了一個夾雜潮流盛事與政治批判、事事月旦、眾聲喧嘩的“民政大迴環”（梁款，2004: 137-42; Ku, 2001）。

這個“大迴環”的基礎，在於一個高度密集、聚焦和互相牽連的民間社會，此外，一個強而有力，相對獨立的媒介體系是它的軸心，而互聯網和各種現代通訊科技更進一步連點成線，代表了一個以“民意政治”對抗“制度政治”的“超強網絡社會”（hyper intensive network society）的出現。

這個網絡社會，集體情緒又激又強，原始正義感與娛樂偷窺慾一爐共治，本質上民粹色彩強烈、不利探索社會文化發展長遠的走向，它最終能否和如何扣連上香港民間新近掘起對“核心價值”的討論，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課題。

立足本土、望向全球

香港人經常翻弄本土經歷、尋找香港意識，性格有時相當內向。但吊詭的殖民經驗和超速的經濟發展，令香港很早已經是世界經濟和文化流通的一個樞紐。“全球化”

對自幼已經迷戀“披頭四”的香港人來說，算不上新事物；新的是香港在當中變動了的地位。

如果我們以一個簡化了的二分法去看，六十年代時，香港是全球經濟文化體系的小角色，在經濟上它擔當加工和轉口的任務，在文化上它接收西方強國的圖騰和影像。到了2000年，香港已變成一個無比複雜的全球網絡中一個重要的關節 (Chan, 1999; Iwabuchi, 2002: Chapter 3)。它跟亞洲區內外的地方，有微妙的互動關係。經濟上它跟其它地方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發展息息相關。它面對劇烈競爭，需要果斷轉型，地區內文化的互相滲透亦製造了新的課題。這個經濟和文化上的新形勢，在文化工業和文化身份兩方面，有確切的發現。

首先，港式文化工業正面臨種種新形勢的挑戰。例如在電視方面，“香港品牌”正受日韓甚至內地劇集的競爭。另外，香港影視要打入內地市場，在內容與協作模式上，仍待探索。曾經一度是香港集體情緒焦點文化之電視電影究竟何去何從？它要保留香港地道特式，還是融入大市場，生產跨文化的類型產品和走向合營、管理、撮合和集散的角色？(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2003: 133-4)

此外，新的政經形勢底下，香港跟內地人口大量雙向流通，這將會在“政治再中國化”的議程外，另添一個民間生活和思想混型的變數。一個參加過七一遊行，曾經大呼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香港人，會如何面對自己往後多年大部份時候會在內地謀生，甚至長遠落地生根的事實？十年之後，住在香港的會稱自己做“香港人”、“住在香港的中國人”、“中國人”，還是“地球人”？

九篇文章

本文集共有九篇文章。第一部份的三篇文章焦點不一，但共同探討了香港吊詭的歷史經驗，並沿途剖析了“殖民與非殖民”、“面向中國還是背向中國”、“跟現代文明接軌還是守住傳統規範”等微妙的對立。過去五十年，香港急速地現代化，香港歷史被壓縮在茶餐廳的餐牌、表面上無關痛癢的日常小事、和鮮為人知的女性自主運動。

第二部份的三篇文章，以香港人近五十年的集體焦點——媒體和消費——為對象，探討了另類文化工業的發展策略、民間英雄偶像的塑造和日常生活裏改名換字所反映的慾望。在此，我們看到媒介鼓動消費，消費滿足慾望，慾望催生集體身份的循環。

第三部份的三篇文章，對國族與本土，全球與地道的拉鋸有貼身的分析。七一遊行所反映的“民意政治”和港式“公眾論群”的生態，在中港漸融，貨櫃司機載着市井國族精神南北兩邊走的形勢下，會有甚麼火花和轉變？活在香港的中國人，是否愛家、愛港、愛國？

中文寫作

這本文集的另一個特色，是全中文寫作。這本身也是對“香港特殊性”的一個回應。香港吊詭的殖民經驗，令香港人對於“用英文”有種矛盾的感覺。文集的作者，大部份土生土長，對他們而言，“讀洋書”、跟“英語世界”打交道，確實令一輩人開啟視野，學懂科學分析，跟

現代文明接軌。另一方面，“寫英文”也為作者勾起種種不愉快的殖民成長記憶。更重要的是，它標示了今時今日“英語”在學術世界的霸權地位。這個霸權體現在香港現今學術制度，特別是評核學者功過的硬指標上 (Ma, 2001b)。作者們在這個制度打滾，對於它的扼殺學術動機和自由的惡果，有深切的體會。以英文在國際學刊發表有關香港的論文，雖然文章的國際“能見度”和令學者的知名度較高，卻往往因需要配合西方社會理論和學術的關注，遷就國際議程，而稀釋本土論述。

然而，強調中文學術創作，並非要把本土研究孤立於國際學術討論之外。保持國際聯繫、參與國際學術對話、探索境外論題、追求國際卓越指標，往往能借他山之玉，激活本土學術，避免固步自封，提高跨地域的普遍對比，令學術視野更為多元化及更具彈性。

我們強調香港的特殊性，但亦意識到當今全球資本主義的普遍性。畢竟，香港是身處全球的消費社會網絡之中，不少社會及文化現象，與全球其他地區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在香港、東京、倫敦、紐約、漢城等城市的本土案例，在理論上均可以互通情理。把香港本土問題孤立，視之為獨立的特殊例子，是失於偏頗。我們的建議是，保持以英語為重心的國際學術聯繫，而與此同時，盡力抗拒英語強勢對本土研究的負面影響。

自然科學是普遍性強而本土性弱，社會人文科學則是立足於本土性格以推敲普及理論。是以偏重國際學術評審，在自然科學領域問題不大；但社會文化的領域，盲目的國際化，對本土研究就有立竿見影的威力。過份強調國

際標準學術評審，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壓抑具體案例分析紀錄，因為國際化的學術生產不會著力於案例的細緻描寫。其二是壓抑本土的學術語言，香港中文的理論語言貧乏，若沒有中文學術創作的誘因，中文理論言語工具難以擴充，不利思考、分析和表達；其三是學術界對社會文化干預乏力，當高質素的學術報告，均以國際刊物評審員為最基本的寫作對象，本土社群自然成為次要甚至毫不重要的讀者，學術的社會干預作用，自然會大大降低。

我們期望香港的研究隊伍，在英語強勢的學術格局之中，保持中文學術創作的傳統。以中文寫作，是一種自覺的策略。它是要在這個不注重“民間普及文化”，不體察“香港特殊性”，不強調“人文”和以為自己在搞“硬科學”的香港學術制度，作出一種示範。它在質疑一種僵化了的權力關係，並希望創出一個較自主而且有生命的文化小空間，讓關心本土問題的學者、學生、研究員、老師等，有一個以中文思考對話的平台。

這就是港式的文化研究。

註

1. 有關該研討會之報告與討論，見Q仔 (1979)。而在“第一屆香港普及文化研討會”之前，曾於1978年夏季辦“結構主義與符號學研討會”。
2. 部份文章可見於吳俊雄、張志偉 (2002)。另可參考一些文集，如邵國華等 (1984)；李焯桃 (1990)；羅貴祥 (1990) 等。
3. 例如：梁秉鈞 (1993)；史文鴻、吳俊雄 (1993)；由陳清僑主編的“香港文化研究叢書”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也斯 (1995)；英文著作，如Ma (1999)；Bordwell (2000)；Fu and Desser (2000) 等。
4. Ethnography，正譯為民族誌，現譯作民俗誌，以突出庶民約定俗成的生活方式。

參考書目

- Q仔。1979。《文化，點只娛樂咁簡單(第一屆香港普及文化研討會處境報告)》，《文化新潮》，第6期，頁4-10。
- 也斯。1995。《香港文化》。香港：香港藝術中心。
- 呂大樂。1997。《唔該、埋單！》。香港：閒人行。
- 呂大樂、王志錚。2003。《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香港：三聯書店。
- 史文鴻、吳俊雄(編)。1993。《香港普及文化研究》。香港：三聯書店。
- 余少華。2001。《中港文化角力與融和》載《樂在顛錯中》，頁1-1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李焯桃。1990。《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筆記》(上、下冊)。香港：創建文庫。
- 明報編輯部(編)。2004。《愛國論爭》。香港：明報出版社。
- 吳俊雄。2002《尋找香港本土意識》載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86-95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吳俊雄、張志偉(編)。2002。《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邵國華等。1984。《文化失言》。香港：曙光圖書。
- 梁秉鈞(編)。1993。《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三聯書店。
- 梁麗娟。2002。《電視文化與港人身分變遷》載李少南編《香港傳媒新世紀》，頁165-19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陳韜文(編)。2004。《七一解讀》。香港：明報出版社。
- 梁款。2004。《還政於民》載陳韜文編，《七一解讀》，頁137-42。香港：明報出版社。
- 姚堯。2002。《聲、色、藝——回顧香港大眾文化的發展》載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頁9-1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章嘉雯。1990。《後匱乏年代》載章嘉雯，《攜改錯液赴考的一代》，頁9-14。香港：青文書屋。
- 馬家輝。2002。《流行與分眾》載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頁58-6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馬傑偉。2002。《電視文化的歷史分析》載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頁138-42及681-94。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2003。《香港創意產業基線研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顧問報告)。香港：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
- 羅貴祥。1990。《大眾文化與香港》。香港：青文書屋。
- Baker, H. D. R. 2003. "Life in the cities: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man" in Pun Ngai and Yee Lai-man (eds) *Narrating Hong Kong Culture and Identit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65-178.
- Bordwell, David. 2000. *Planet Hong Ko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 Hau Nung, Annie. 1999. "Consumption, popular cul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y: Japan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23(1): 35–55.
- . 2000. "Middle class formation and consumption in Hong Kong" in Chua Beng-huat (ed) *Consumption in Asia: Lifestyles and Identities*. London: Routledge, pp.98–134.
- Fu, Poshek, & David Desser (eds). *The Cinema of Hong Ko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wabuchi, K. 2002. *Recentring Globalization: Popular Culture and Japanese Transnationalis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u, Agnes. 2001. "The 'public' up against the state — credibility crisi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8(1): 121–144.
- Leung, S. W. 1999. "Social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y: a partial account" in Lau S.K. et al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7*.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111–134.
- Lui, Tai-lok. 2001. "The malling of Hong Kong" in G. Mathews and Lui T.L. (eds) *Consuming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23–45.
- Ma, Eric K.W. 1999. *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 . 2000a. "Re-nationalization and me: My Hong Kong story after 1997"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1): 173–9.
- . 2000b. "Media,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Hong Kong" in James Curran (ed) *Media Organization in Society*. London: Arnold, pp.255–272.
- . 2001a. "The hierarchy of drinks: Alcohol and social class in Hong Kong" in G. Mathews and Lui T.L. (eds) *Consuming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117–139.
- . 2001b. "Peripheral vision: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in Hong Kong" in Toby Miller (ed)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pp.275–297.
- Mathews, Gordon. 2003. "Heunggongyahn: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identity" in Pun Ngai and Yee Lai-man (eds) *Narrating Hong Kong Culture and Identit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51–72.
- Ng, C.H. and T.W. Wong. 1999. "The ethos of Hong Kong people: Taking stock in 1997" in Lau S.K. et al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7*.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233–253.
- Sinn, Elizabeth (ed). 1995. *Culture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iu, Helen. 2003. Hong Kong: Cultural kaleidoscope on a world scale” in Pun Ngai and Yee Lai-man (eds) *Narrating Hong Kong Culture and Identit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13–134.

Williams, Raymond. 1980. *Culture*. Glasgow: Fontana.